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6 期
2004 年 6 月，頁 23-33
特邀稿件

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一面

川合康三*

摘　要

一直接收中國文化、學術的日本進入明治維新以後一下子流入了西歐的文化。這種傾向是從傳統的中國文化轉換爲吸收西歐的近代文化，在原來日本的學術內涵裡頭也因爲接觸了異質文化而產生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就是「中國文學史」的出現，到近代爲止，從歷史學到文史學的觀念之形成很早就被日本接受，一直到「日本文學史」被書寫爲止。受到這個刺激，從 1890 年代末期「中國文學史」逐漸的被刊行，而在日本出現的「中國文學史」不久也傳到中國，在中國也因此寫了中國文學史。在此之前，所謂的中國文學史這種書籍是沒有的。無疑的只有文學史是因爲漢學的積蓄與西歐的觀念相結合而形成的產物之一。

初期中國文學史的執筆者們多是二十年代的年輕人，雖然他們年輕，但是他們一方面吸取了新的知識，一方面對新的漢學架構發揮了很大的貢獻。而這些功績並沒有受到正當的評價。正當中國與西歐，傳統與時代的變化相互激進的時期，他們如何再創漢學的生機，本文將透過「中國文學史」探討它的實況及意義。

關鍵詞：文學史、聊齋誌異、東洋、西洋

*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Birt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 Approach to Chinese Literary Study of Jap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Kawai ,Kouzo*

Abstract

After the Meiji Reformation, besides Chinese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Japan begins to absorb modern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and knowledg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one of the major items i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late ninetieth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result, even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ppears. We can say that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s a combination of Sinology and Western European ideas.

At first, most of the Japanese writers are young scholars. They not only imbibe new ideas and knowledge, but also build up a new framework of Sinology. But their contributions are underestimated. They should get proper appraise and evaluation. And this is the aim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history of literature, *Liao-Zhai-Zhi-Yi*(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Japan, the West(the Western worl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of Kyoto University

「中国文学史」の誕生
—二十世紀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研究の一側面—

川合康三*

要　旨

西暦 1900 年を間近にした頃、日本では突然、中国文学史が続々と出現した。その中には後に中国で書かれる中国文学史に影響を与えたものもあった。なぜその時期に一斉に中国文学史が誕生したのか。なぜ日本においてかくも早い時期に一斉書かれたのか。それは伝統的漢学の蓄積と西欧近代の受容とが結合したものであった。西欧に成立した近代歴史学は文化の様々な面における通史の執筆を促し、国別の文学史を生み出すこととなった。いち早く西欧近代を摂取した日本では日本文学史が初めて書かれ、それに刺激を受けて中国文学史も書かれたのである。それは日本の文化・学術が漢学の伝統と近代の受容との間で揺れ動いた、混乱しつつも力のみなぎった時期であった。漢学を中心に当時の学術界のありさまを考察しつつ、併せて文学史執筆に関わった人々の知の相貌を追跡する。

キーワード：文学史、聊齋誌異、東洋、西洋

*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文學史的誕生
－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之一面－

川合康三 著；朱秋而 譯*

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顧二十世紀日本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將有助於展望我們未來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紀的中國學所涉極廣，而在中國文學領域「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因此本文將具焦於此進行討論，從探討中國文學史如何產生思考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特質之所在。

中國文學的歷史超過三千年，「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卻不過是短短的兩百年，因爲要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以「中國文學史」爲題的書刊，早期在日本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如下：[1]

児島獻吉郎〈支那文学史〉 1891~1892 雜誌《支那文学》第 1 號～第 9 號

藤田豐八〈文学小史〉 1894? 雜誌《支那学》第 1 號、2 號、9 號

藤田豐八《支那文学史稿》 1895？～1897？ 東京專門學校

古城貞吉《支那文学史　完》 1897 東華堂

笹川臨風・白河鯉洋・大町桂月・藤田劍峯・田岡嶺雲《支那文学大綱》 1897~1904　大日本圖書

笹川種郎《支那小説戲曲小史》 1897 東華堂

笹川種郎《支那文学史》 1898 博文館

高瀨武次郎《支那文学史》 1899～1905 哲學館漢學專修科講義錄

久保天隨《支那文学史》 1903 人文社

久保天隨《支那文学史》 1904 早稻田大學

松平康國《支那文学史談》 ？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宮島繁吉《支那近世文学史》 ？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

*川合康三：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朱秋而：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1] 有關日本刊行的中國文學史請參見《中国の文学史観》(川合康三，創文社，2002)的「資料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児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 1909 冨山房
児島獻吉郎《支那文学史綱　全》 1912 冨山房
児島獻吉郎《支那文学史》 刊行年不詳 1921 以後？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其實早在上列各書之前，還有末松謙澄的《支那古文學略史》（1882，文學社）一書。此書刊於明治十五年，比其他文學史大約早了十年左右。可是末松的這本書雖然名爲「古文學略史」，實際內容卻是先秦學術史[2]，這可能是明治初期「文學」一詞的意涵尚搖擺不定所致。鈴木修次在〈「文学」の訳語の誕生と日・中文学〉[3]一文中指出，雖早在明治八年（1975）《文部省報告》第二十一期首次以「文學」一詞翻譯 literature，而普及開來似乎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末松使用的「文學」顯然是指以哲學・文學・史學爲主的學術，可見「文學」一詞在當時仍以漢語的傳統意涵流通，因此不得不把《支那古文學史略》屏除於一連串的文學史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末松這本書是根據末松那年給旅居倫敦的日本人發表的演講寫成。在倫敦講述中國的古代學術史，與英國是西洋古典學的牙城不無關聯，無疑是受英倫向來尊重西洋古典學和豐碩的研究成果刺激下，企圖展現東洋也有能和西洋相抗衡的古典傳統、學術歷史。

另外在初期的文學史，往往由「文學」的語義、定義寫起，這意味著當時翻譯用語「文學」一詞尚未完全固定。當然中國的情形也相同，文學史的論述經常由什麼是文學寫起的現象，戴燕論文也已有論及[4]。排除末松一書，literature 的翻譯語彙「文學」的歷史，即現在通行的文學史、以中國文學爲對象的文學史敘述，在一八九〇年代，尤其是後半期一起開始，各家爭鳴的景況如前所示。

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向來被奉爲世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確實稱古城貞吉的文學史是首尾一貫的中國文學史之濫觴並無不妥，

[2]請參見注 1「資料篇」中的「明治篇」，松本肇的題解。
[3]鈴木修次《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汲古書院，1986）
[4] 戴燕〈文學・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論本世紀初“中國文學史”學的發軔〉《文學遺產》1996 年 6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如前所示，了解了短期間中國文學史書籍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版，還問「世界上最早的中國文學史爲何？」，簡直與金氏紀錄的設問一樣毫無意義。問題不在什麼最早，而是一八九〇年代後半名爲「中國文學史」的書籍突然一齊登場。而以前綜觀中國文學歷史的書籍幾乎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的確相當詭異，原因何在？

上列的書中有些是以大學的講義錄形式寫成的，例如：以児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爲首，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爲東京專門學校、高瀨武次郎《支那文學史》爲哲學館、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爲早稻田大學的講義錄，可見中國文學史一部分是與當時日本設置大學、及因應中國文學講座開課的產物。此雖爲其外因之一，但是非講義錄的著述也不少。古城貞吉、笹川種郎等均以單行本出版，到『支那文學大綱』更是中國文學史上代表性的人物一人一冊，由數名作者分別撰寫，成爲一大部頭的叢書。儘管有因大學設立而來的編寫教科書的情境，應該是將此情況也統攝在內的大的氣運時勢所造就的。

我們可從文學史序文中略窺當時氣運之一端。列舉的文學史中幾乎都提到，明治維新以來，長久以來奉中國爲皋臬的日本，一舉轉向西洋看齊，以致中國學術文化被忽視的危機感。主張日本有東洋的傳統，此傳統不應被閒置，例如：井上哲次郎爲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寫的〈序〉說

> 雖然我國不少文化得自支那，西洋學術傳來，反而凌駕支那之上，國人因此嚴重鄙視支那，辮髮奴連兒童都不齒，更何況堂堂的男子漢？事到如今，難道就該把支那文學從我們的研究領域驅逐出境嗎？
>
> 看到學者們痛批四書五經腐敗之狀，或許有些人會贊成，但此見解之荒謬，一想即知，殊非難事。…

江戶到明治，從政治經濟到學術文化所有的領域都是由中國激烈的轉換成西洋。整體的方向都是由東洋轉換爲西洋，實際上的流向雖非一直線，而是歷經了迂迴曲折的西洋與東洋不斷的相剋而來的。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滿清，這成了日本人改變對自己的學習對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文化先進國中國的看法之一大契機，透過戰爭的勝利，意識到對中國的優越性，以致更加傾倒於西歐而蔑視中國。在中國文學史出現的前夕，尊崇東洋傳統的人士內心應該是充滿著危機感。

當時中國文學史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的，一樣具擁護中國傳統意圖，但稍有不同的是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除了不變地提倡中國傳統文學價值外，藤田試圖從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之一，從世界文學的一環來捕捉中國文學。如此宏觀的視野超越了非東洋即西洋的時代選擇，直可通用至今的真知卓見。

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全國激烈傾向歐化，但是重新評價中國傳統的反動也一直根深蒂固，因此在考慮該動向爲何蘊育出「文學史」之問題時，文學史的固有因素也須一併考慮。

其實「文學史」是西歐近代才出現的新概念。文學史形成的前提，當然歷史學非成立不可。近代史學確立於十九世紀，在該史觀的基礎下，寫成了各個文化領域的通史，文學史的誕生也是其中之一[5]。雖然 Rene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將 Thomas Warton 的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1774-1781）視爲最早的英國文學史，但真正結合歷史與文學作科學性敘述而確立文學史的應推，法國的 Hippolyte-Adolph Taine 的《英國文學史》(1863-64)。此巨著才真具影響力，是日後文學史隆盛的契機，如此意義重大的文學史卻假外國人之手完成卓實耐人尋味。

敏感反應西歐文學史出現的是明治時期日本文學的年輕學子們，三上參次、高津鍬太郎《日本文學史》上下兩卷（1890、金港堂）屬最早期的日本文學史，「緒言」中提及駐書的來龍去末。

> 兩位作者大學時閱讀西洋文學書籍，讚嘆其編法得宜，又有所謂文學史，可詳觀文學之發達，喜其研究順序之完備。當時我國沒有這類文學書，也無文學史，倍感研究本國文學比外國文學更加

[5] 參考 Lentricchia, Frank McLaughlin,Thomas 編《現代批評理論》(大橋洋一等譯，平凡社，1994)，的「文學史」項（李・潘德生執筆）。
6Rene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pel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困難，總是羨彼憐此，興起如何讓我國有毫不遜色的文學書和文學史的慷慨之念。（一頁～二頁）

又在「緒言」後半部列舉「法國碩學」（Hippolyte-Adolph Taine）等西歐文學史家的名字，以西歐爲範甚明，「本書實本邦文學史之嚆矢也」（九）於焉誕生 。

早在三上、高津《日本文學史》之前，《史學協會雜誌》第二號（1883）至第十九號（1884）斷斷續續地刊載小杉榲邨的「文學史」，同時連載了木村正辭的「文學史附說」和栗田寬的「文學史贅言」[6]。都是簡短的口述，完整的一本文學史著述的刊行要遲至進入一八九〇年代之後。列舉如下：

> 小中村義象・增田于信 《中等教育日本文学史》博文館、1892
> 大和田建樹 《和文学史》博文館、1892
> 鈴木弘恭 《新撰日本文学史畧》青山堂、1892
> 新保磐次 《中学国文史》金港堂、1895
> 芳賀矢一 《国文学史十講》冨山房、1899

日本文學史的情形也與中國文學史相同，大致和三上、高津同時期陸續有其他人的著作刊行，相對於「日本文學史」在一八九〇年代前半出現，「中國文學史」則集中在一八九〇年的後半正說明了兩者的關係。「中國文學史」的作者諸公雖未明言，「日本文學史」在一八九〇年代前半相繼問世一定是催促中國文學史編寫的直接刺激。古城貞吉自述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秋開始寫作《支那文學史》（同書「凡例」），正好是三上、高津《日本文學史》出版的隔年。

以《挑釁的文學史》聞名的耀斯爲了挑戰文學研究者的學問集大成式的文學史，開始獨特的文學史寫作，不必等耀斯指出，一般認爲文學史是有具備相當功力的文學家的工作。可是一八九〇年代輩出的日本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的作者，毫無例外，全都是非常年輕時期寫成的。三上參次二十五歲、古城貞吉三十一歲、藤田豐八、笹川種郎

[6] 小杉的「文學史」在《史學協會雜誌》第二號、第四號、第七號、第十二號（以下 1883）、第十九號、第二十四號，木村的「文學史附言」在第六號、第七號、第十一號，栗田的「文學史贅言」在第十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刊登。

臺灣大學學術

二十八歲。這也呈現出在當時文學史是最新的風潮，只有對時代的新動向敏感的年輕世代才可能去作的嘗試。

文學史本來就是源自於西歐，西歐當然有想編撰中國文學史的動靜。最有名的是 Herbert A.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序文日期爲一九〇〇年十月。此書當初是以是 Edmund Gosse，LL.D，主編的“Short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叢書的一冊刊行的。Giles 在書裏說「這是包括中文在內的任何語言，描寫中國文學的歷史的最初的嘗試。中國的學者不斷地對各個作品提出批評或鑑賞，似乎不曾有過文學史的企圖」。可見當時中國尚未出現文學史，也是西歐最早出現的完整的中國文學史。附帶一提，叢書所錄日本文學史是 W.G. Aston 所寫的“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有明治四十一年（1908） 柴野六郎的日譯本（《日本文學史》大日本圖書），譯者自序說「大體結構採自高津、三上兩人的日本文學史」。

不管是西歐或是日本，都在十九世紀末出現中國文學史，可是真正影響中國的是日本人寫的中國文學史。朱自清就曾寫道早期在中國寫的中國文學史大多受日本人的中國文學史的影響[7]。翻檢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黃山書社、1986），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的中譯本有笹川種郎的《歷朝文學史》（一九〇三，上海中西書局）、古城貞吉《中國五千年文學史》（一九一三，開智公司）等等外，有人指出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一九一〇）模倣的是早稻田講義錄，而曾毅《中國文學史》（一九一五）和康璧城《中國文學史大綱》則分別襲用児島獻吉郎的文學史和笹川的《歷朝文學史》。

西歐的中國文學史對中國的影響不及日本人寫的，因爲西歐不像日本有系統的接受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還有西歐當時的文學觀與中國傳統文學觀有相當的距離。鄭振鐸在「評 Giles 的中國文學史」[8]一文，批評 Giles 的疏漏，連實用的園藝入門書般的書籍都收入中國文學史，這是中國傳統學術並未以正統性的形式被接受與理解所造成

[7] 朱自清〈什麼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潮－－林庚《中國文學史》序（四）〉（初出 1947 年。《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初出 1934 年。收於《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還有對該書中所舉《聊齋誌異》，鄭振鐸認爲評價過高，「在中國小說中並不算特創之作」（33 頁）等非難都透露出當時東西方對文學看法的差異。之後，《聊齋誌異》成了文學史不可缺的作品，當時是西歐人士率先承認小說的價值。相較於以戲曲和小說爲中心的西歐近代文學，在傳統的中國文學觀下，這類俗文學作品尚未取得應有的地位。在日本可能是受西歐近代文學觀影響，對俗文學這塊全新領域的展開熱烈的探求。古城的文學史中雖無俗文學的敘述，笹川的文學史論及元明清的俗文學，甚至還有專著《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宮崎的《支那近世文學史》也爲元明清小說戲曲設章。儘管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是以笹川之作爲藍本，卻認爲該書納入俗文學的部分是見識拙劣不足爲範。中國的傳統觀念如此牢不可破，而在日本西歐文學觀應當已經十分地普及。據《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所載，在中國的文學史將戲曲、小說採入的是從張之純《中國文學史》（1915）、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1918）前後才開始。

以上釐清了中國文學史的概念，以此爲基礎的書籍，先出現於近代西歐，東渡日本蘊育日本文學史，受此刺激而有中國文學史的撰寫的過程。透過「中國文學史」的誕生此一事象，不正可一窺日本中國研究的特徵嗎？換句話說，日本在明治以前長期累積了中國的傳統學術，再結合明治以後流入的近代西歐文化，而誕生了「中國文學史」。當時日本的年輕學子輕而易舉的投入「文學史」這個新領域，不正因爲他們雖保有中國傳統卻不似中國般根深蒂固，比較容易吸收新事物嗎？關於文學史，其實在更早的十八世紀的江戶時代就有出自日人之手，而近於文學史的著作，即江村北海（1713-1788）的《日本詩史》五卷（1771 刊行）。眾所週知，「詩史」一辭指杜甫的詩以詩描寫出當時的歷史，是「以詩爲史」之意。在中國此語應無「詩的歷史」的用法。在日本轉用「詩史」一語試圖描寫日本漢詩（中國古典詩）的歷史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出現，這不也是因日本人是外國人之故，多少能掙脫傳統的束縛的一例証嗎？

在傳統的累積與近代西歐知性導入的結合外，必須加注當時西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東洋的熾烈的相剋。在兩種異質的文化糾葛下產生的緊張感，唯在其中爐火純青的工作才能展開不是嗎？

事情並不侷限於「中國文學史」的誕生，二十世紀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以長久吸收中國文化的累積爲基礎，接受西歐新的思考方法，展開日本獨自的研究。西歐沒有累積日本般完整的容受歷史，而在中國傳統又重得令人無法輕盈地轉換，日本在西洋與中國的山谷間綻放研究的花朵。

但現在日本一般的知識份子完全缺乏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素養，明治執筆寫中國文學史者所依據的基盤已經瓦解，當年二十幾歲，有些還未必是中國文學的專家的作者能寫長篇的中國文學史等，以變化成現在完全無法想像的地步。加諸近代西歐的知性在東洋已不再爲日本所獨占，近代本身也快被跨越，文學史這樣的近代產物的有效裝置也漸漸失靈，超越近代的知性樣態才是探求的重點。

到底今後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該何去何從？就文化一般而言，中國的事物的比率大概會日漸下滑。研究與文化一般不相干，必須限定專門的領域。而在研究領域，促成世界均一化的全球化會繼續。在全球化的同時，特別會敏銳的意識各文化圈的個別特質。在日本文學傳統文化的關聯中探索中國文學的關心會更深化。人文科學尤其是古典學，今後該如何？或者可能嗎的大問題，答案難找，不過我們正處於大的轉換點上是事實。在此低迷不振之中，至少抱持鮮烈的問題意識或許是活路也說不定，就像明治的文學史在東洋與西洋的葛藤中完成了他們的志業一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